边疆民族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郭成康

[摘要] 清宣统三年末，隆裕皇太后在清帝逊位前夕向全体臣民宣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历尽沧桑、千锤百炼的"中国"概念，终由清朝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一词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清朝 中国 中国观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5) - 05 - 0001 - 18

The Qing Emperors Conceptions of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Xuantong reign, prior to the emperor's abdication, the Empress Dowager Longyu, proclaimed to all subjects, that "it is the sincere hope that all the people will enjoy a settled life, peace will reign throughout the land, the integrated territory, including the five nationalities of Manchu, Mongol, Han, Hui, and Tibetan, will still combine to form a great Chinese nation state." Through several thousands years' of historical sediment, the notion of "China" and "Chinese nationality", which had gone through many hardships and revisions, was given the final word by Qing dynasty.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Qing dynasty not only bequeathed the present Chinese territory and the material wealth of united multi - nationalities country, but also the precious spiritual legacy of the content and denotation of "China" and "Chinese nationality."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明代的中国，主要依托中原农耕地区的明朝，隔九边与蒙古族所建立的北元及尔后的鞑靼、瓦剌以敌国长期对峙。迨明朝末造，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从明万历十一年 (1583) 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 (1644) 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大约 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

[收稿日期] 2005 - 6 - 30
[作者简介] 郭成康 (1941—)，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大清国”。[1]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2]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

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3]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4]“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与明朝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取代。[5]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信中首揭后金国号[6]，直到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金国作为国号近20年。

“女直国”(建州卫)、“建州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族认同，国名反映建州女真模糊的国家概念；“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这个共同国家名称之所以取名为“后金”和“大金”，则在于向外间彰显继承的是历史上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的统绪；皇太极改“金”为“清”，从国家认同来解释，是因为当时金国治下的臣民虽以满洲为主体，但同时已融入数量众多的蒙古人、汉人以至朝鲜人等，金国的国名既涵盖不了满洲以外的民族，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难于接受这一包含历史宿怨的国号。

满洲兴起时，对女真相邻各部以及与满洲或战或和的蒙古各部动辄也以国相称，如称所谓“九部联军”为“九国兵马”[7]，称海西四部为“哈达国”“夜黑国”“兀喇国”“辉发国”[8]，蒙古各部则称为“蒙古诸国”，蒙古察哈尔部则称为“察哈尔国”[9]，等等。可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并没有也不可能将“部落”与“国家”做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区别，他们不过随着自身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认为自己有权利与汉人一样创建国家、更改国号。对满洲如此，对同样被明朝视为“夷虏”的其他女真各部和蒙古各部也是如此。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在他们“建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明朝，他们心目中“中国”和“天下”的概念是什么？

在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称明朝为“大明”“朝廷”“天朝”[10]，既公开称王称帝，立国建元，则称明朝为“明国”或干脆与明朝尔我相称，甚至称明朝为“南朝”[11]，俨然以“北朝”自居。他们虽然仍奉明朝为“中国”[12]，但认定“中国”并不是明朝皇帝，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建元“天命”并改国号“后金”时，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岂止于此，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远景。[13]皇太极直接继承发扬了努尔哈赤的志向，他向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宣称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等：

> 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4]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女真人支脉，有“本大金之裔”[15]的强烈意识，又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他们继承的是北方民族大胡和东胡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他们的实力足以自立甚至与明朝治下的“中国”抗衡时，以“辽金元三国之主”的后继者自居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承袭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国观和天下观的明朝和朝鲜看来，则是骇世惊俗大逆不道的举动。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起兵未久，朝鲜政府就得到情报称“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将为报复中原之计”[16]。至建国后金，明朝方面更惊呼“（奴酋）黄衣称朕”[17]。但必须指出，无论崛起中的边外枭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上面已经提及，努尔哈赤在与大明决裂前，自称“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所谓“边疆”，明白无误地指“朝廷”的边疆，这里透漏出来的是奉明朝皇帝为主的大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后金起兵揭开了长达25年之久的对明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从来没有萌生过在国家版

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念头，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入关占据燕京（或南京或汴京），取代明国，以为天下中国之主的宏图伟业。另一方面，明朝也没有把建州女真视为“属国”“外国”。据《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壬子条：“廷议以朝鲜为藩篱属国，海建乃款市贡夷，均受国恩，各宜自守。[49]所谓“海建”，即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明廷认为海、建的地位不能等同于“藩篱属国”朝鲜，他们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是“款市贡夷”。可见明朝皇帝尽管鄙视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为“东夷”，但并没有将他们摒弃于大中国之外。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他们奉明朝为“中国”，但环“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他们和“中国”一起构成了“天下”。努尔哈赤讨明檄文《七大恨》中第七恨指责明朝偏袒哈达、叶赫，与建州为敌，他说：“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49]这与日后皇太极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50]，其内涵与逻辑都是一致的，即明朝皇帝作为得天命的大国之君，作为“天下”共主，在“中国”周边各“国”各“部”发生纷争时，自当秉公持正，剖断是非。如“中国”之君逆天妄行，失去上苍眷佑，则自有取而代之者。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多次讲过中国古代天命循环、鼎故革新的事例，从成汤代夏桀、文王兴起代纣王之业、刘邦以布衣起兵卒灭暴秦、金太祖阿骨打灭辽灭宋、蒙古成吉思汗得金帝之业建立元朝，直至明朝朱元璋幼失父母，孤身为僧，“后天命归之，遂为天子”，结论是“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或天命有归，即国之寡小勿论，天自扶而成之也。[51]所以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治下的以中原为主的区域。他们在没有实现取代明朝统治并履行“奉天承运”庄严仪式之前，承认天命仍为大明天子所有，大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是“大国”。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谓的“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概念；他们使用的“天下”一词，庶几与今天常说的“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相近。

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使用“中国”和“天下”这一概念时，不自觉地沿袭了汉族中原王朝的“中国”观。众所周知，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就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而论，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嗣后，华夏族建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中国”，而周边“蛮夷戎狄”则谓之“四夷”；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这些主要汉族活动的地区，都在“中国”一词的涵盖之下，[52]而周边各族生息繁衍的广袤地域却被浸透着“夷夏之防”观念的汉族史家及学者文人视为“中国”之外的“化外”蛮荒。

显而易见，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在批评“华夷之辩”大汉族主义倾向时，要准确阐释在所谓“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53]春秋大义中“中国”与“四夷”共处“天下”的同一的一面。《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言“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54]，明太祖朱元璋讨元檄文所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55]，与上文所举《明神宗实录》将海西、建州女真与属国朝鲜加以区别，都雄辩地证明，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

总之，身为夷狄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甘被自视优越的汉族视为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下

等族类，他们必欲争取华夷平等的政治理念以及建国称帝的举动，强烈地震撼了江河日下的明朝统治者，对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辩”理论体系也发出了空前有力的挑战。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在不脱离大中国的大前提下，努尔哈赤父子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体认与传统儒家的国家观并无二致。恪守祖宗家法的清太祖、清太宗的后世子孙们，将在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以天命所归的“天下中国之主”的角色，解释、演绎和推广他们在开国时代的理念和经验。

“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陷京师，崇祯自缢于煤山，明亡。四月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定进取中原大计，此时犹不知明朝灭亡。四月九日，多尔衮率大军启行，十三日师次辽河，始知大顺军占领京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清军与吴三桂军联合击溃李自成大顺军主力，追杀四十里，五月二日入据京师。当年十月，顺治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称大清国皇帝“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26]此前一年，顺治在盛京刚履行过大清国皇帝祭天登极仪式，此时他二度祭天登极，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他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实现了其父祖得天眷佑的遗愿，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明清鼎革，顺治虽不改关外时期“大清国皇帝”名号，但清朝皇帝的角色实际上已发生本质变化。下面首先探讨他们对“中国”概念的理解。

清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27]故明所辖的版图及版图上的子民全部归其所有，故明所代表的一切国家主权由其行使。尽管顺治以至康熙中期40年间清朝还在步步推进着对明朝治下“中国”的统一事业，但他们对整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坚定的原则立场。定鼎燕京前，南明诸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遂致书史可法，称“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28]”“中华”大国为清朝所主，故明福王可以远仿关外孔、耿、尚三王，近效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甚至可望“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但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分割，“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再看康熙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谈判。顺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为抗清基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熙打算采取招抚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允许承继郑成功统治台湾的郑经接受“藩封，世守台湾”[29]。但在谈判中郑经坚持“比朝鲜，不削发”作为投诚条件，被康熙断然拒绝，理由如康熙所言：“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30]。因此，清朝与台湾郑氏集团的多次谈判皆无果而终。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业已平定，而台湾内部又呈乱象，康熙决策命将出兵，一举统一台湾。

与江南、台湾有所不同，明朝未能实施直接统治的厄鲁特、喀尔喀等边远地区，则暂时可以划界分治。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与厄鲁特因边境“番夷”归属发生纠纷，顺治传谕厄鲁特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说：“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31]”“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清楚地诠释了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国”的概念。尽管边远地区还一时不能纳入中国版图，但与故明曾有封贡关系的汗王活佛只要承认清朝“中华大皇帝”的地位，仍然可以延续以往与“中国”的关系。顺治在赐西域阐化王王舒克等贡使瑣诺木必拉式号妙胜慧智灌顶国师时说：“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32]原来明朝的属国，亦照此思路一体办理，如清初琉球通过改

换敕谐印信很快恢复与中国的宗藩关系。[33]

上述事例表明，清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时沿袭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沿袭了古代传统“中国”的概念，是指古代汉族王朝治下的以中原内地为主的地区。所谓“以绥中国”“抚定中华”[34]含义就是，将次第削平中原反清势力，首先完成“中国”统一。然而，毕竟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清初“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一是漠南蒙古，一是满洲发祥地广袤的东北地区，都已视为“中国”版图了。

漠南蒙古，清朝文献称“外藩四十九旗”、“四十九旗”[35]、“内蒙古”[36]、“内扎萨克”[37]、“旧藩蒙古”[38]等，共二十四部，是从明朝边外蒙古演化而来。其归附清朝原委，康熙《大清会典》作了这样叙述：鼎革前“率先归附”，土地人口“悉隶版图”[39]。其疆理“东至盛京、黑龙江，西至厄鲁特，南至长城，北至朔漠，袤延万有余里”[40]。有关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虽称“外藩”，实“视内八旗无异”[41]。正如乾隆《大清会典》所说：“国家肇基东土，威德远播，漠南蒙古诸部落，或谊属戚畹，或著有勋绩，或率先归附，咸奉其土地人民，比于内臣”[42]。从清朝文献，特别是清初文献考察，漠南蒙古不过借用了传统“外藩”说法，其实质却与内地各省并无不同；岂止并无不同，其与清廷关系的紧密程度还要超过内地各行省，“视内八旗无异”、“比于内臣”之类亲切提法就足资证明。满族统治者毕竟与怀有“华夷之辩”偏见的汉族统治者不同，而与蒙藏民族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历史上他们对汉族中原王朝统治者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因此清朝皇帝一旦为中国之主，很容易视蒙藏民族为盟友，而蒙藏民族因气类相近的满洲作了“中国”皇帝，因此常取不自外于“中华大皇帝”的态度。这在下面还要加以阐述。但对待蒙藏民族上层汗王活佛的规格又取决于他们对清朝皇帝的政治态度，漠南蒙古在满洲创业时“率先归附”，所以格外珍视。关于漠南蒙古的地位，还要特别重视清初文献“悉隶版图”的提法，及体现“悉隶版图”诸标志，即有关漠南蒙古各部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的管理体制，这里应特别指出体现国家治权的编户、比丁、刑罚几个最重要方面，以及直接由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管辖的隶属关系。与传统汉族王朝对待所谓化外蛮荒“夷狄”地位的体认及由此决定的“羁縻”式粗放型管理体制比较，清初皇帝对漠南蒙古的态度、政策和管理体制具有突破汉族中原王朝固有框架的开创性历史意义，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的意义不可低估。在清朝皇帝看来，漠南蒙古是率先经过整合纳入“中国”版图的边外民族，这一从开国时期逐渐摸索积累的经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此后百年间，昔日边外其他蒙藏民族情况虽殊，但大都按照漠南蒙古模式陆续纳入大清国版图。

东北地区是满洲发祥地，八旗入关后，仍是陪都所在，白山黑水的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之间还生活着满族及其兄弟民族，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理所当然是在清朝皇帝治下的版图之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国与俄国签订划定中俄边界东段的《尼布楚条约》并立碑于界，以记两国边界走向，《清圣祖实录》这样记载此重大事件：“碑曰：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43]条约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这足以证明广袤的东北地区早在清开国时期已纳入大清版图，随着清朝皇帝入关为“中国”之主，那里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为“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还有清初皇帝使用“天下”一词的含义。昔日努尔哈赤对明国万历皇帝讲“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如今明清鼎革，乾坤翻转，作为天命所归的

“大清国皇帝”已承继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理所当然是“天下共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下”一词，空间含义甚为深广，康熙说：“地理上应天文，宋儒云：天下之大，不可执中国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49]康熙中，喀尔喀内乱，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归附清朝并为康熙所接纳，准噶尔为此责问清朝使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阿喇尼答称：“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50]这里的“天下”是相对“中国”而言，指环绕“中国”的第一重空间（“天下”的第二重空间，下一节展开论述），那里居住着与“中国”同根、但尚未“向化”的“四夷”，当时主要指“中国”周边喀尔喀、厄鲁特、青海蒙古和西藏等尚未纳入大清版图的边远地区。康雍乾时期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天下”第一重空间纳入“中国”版图，使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中国”化。

先来考察这些地区与清朝关系的实际状况。

定鼎燕京前，喀尔喀三部、厄鲁特与清朝已通使问好，[46]故入关后称其为“旧好之国”[51]。但如康熙日后所言“昔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后欲全收北边喀尔喀，未及行而太宗文皇帝宾天”[52]。可见喀尔喀、厄鲁特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不同，清开国时并未纳入清朝国家版图。明清鼎革，入关伊始，天下大势未定，不可想象蒙古大国喀尔喀、厄鲁特会立即向自称“统驭天下中国之主”的清朝皇帝三跪九叩，俯首称臣。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喀尔喀至康熙中内附，厄鲁特则至乾隆二十年代，胜负才见分晓。这中间喀尔喀、厄鲁特与清朝或战或和，清朝称其为“部落”“国”“尔国”[53]或“本朝职贡之国”[54]，其来“进贡”者称为“使臣”。但清初皇帝作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居高临下，对喀尔喀、厄鲁特等行文称“敕”，喀尔喀、厄鲁特来书则称“表”，仿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对其“酌封名号，给之册印”[55]，顺治谕旨甚至对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曰：“朕为天下主，尔乃弹丸小国之长。”[56]在形式上，喀尔喀对清朝还有所谓“九白年贡”，清朝则回报以丰厚赏赐。[53]对清朝来说，这一切关乎国家体统尊严，不过，见于清官书记载的“朝贡”“上表”“册封”之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实际上喀尔喀、厄鲁特追求甚至坚持与清朝地位平等，顺治中，曾为清朝使臣觐见喀尔喀汗礼仪争执不下，停止遣使。[34]康熙荡平三藩后特派大臣往喀尔喀、厄鲁特宣谕并大加赏赉，使臣奇塔特等请示“敕书赏物，臣等作何交授”，康熙说“伊等向行之例，俱用蒙古礼。今若凡事指授而去，或致相岐，行事反多滞碍。厄鲁特、喀尔喀依彼蒙古之例，大加尊敬，则已。[57]可见康熙并不拘泥晋见蒙古汗王礼仪的形式，而从两国关系现状出发，指示使臣入乡随俗，便宜行事，行“蒙古礼”亦无不可。清初与喀尔喀时有战事，双方文书来往，不免恶语相加。喀尔喀部落札萨克图汗称满洲为“红缨蒙古”[58]，顺治立刻反驳说：“我朝原系红缨满洲，所称蒙古为谁？”又针对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质问“意欲与我敌体乎？[59]剑拔弩张，俨然处于敌对状态，以故喀尔喀内附之际，清廷大臣还说“喀尔喀素称不驯”，“汗等恃其部族人民数十万众，未尝躬修臣节”。[38]在这种长期紧张对峙的情况下，同为蒙古但被视为“属下蒙古”[60]的“四十九旗”与喀尔喀、厄鲁特“分疆别界”[61]。界址称“边汛”、“汛界”[62]。喀尔喀与清朝的关系至康熙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康熙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大举东进，喀尔喀三部分崩离析，部众溃散。康熙毅然决策，接纳归附喀尔喀汗王及其离散部众，并借此天赐良机，派出漠南蒙古各旗贤能都统、副都统，由蒙古王等带队，将喀尔喀“俱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以来年草青时为期，指示法禁，如四十九旗一例施行。[63]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命“喀尔喀七旗与四十九旗同列”，喀尔喀王贝勒贝子公等放弃“蒙古礼”，对康熙皇帝“三拜九叩”[64]，表示臣服。喀尔喀既与四十九旗同列，理藩院遂题请照四十九旗例给与印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亲王策妄扎卜三部落分为三路：土谢图汗为北路喀尔喀，车臣汗为东路喀尔喀，亲王策妄扎卜为西路喀尔喀。[64]喀尔喀

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并被康熙倚为比历史上长城还要坚固的“长城”，但不是为防御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内北方民族的，而是“防备朔方”[69]。

从清朝文献考察，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的名称、统属和定位在康雍之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康熙《会典》中喀尔喀蒙古列于《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条目之下，记其“以时朝贡，奉职惟谨”，“国家以羁縻之意，溥怀柔之仁”，地位“视四十九旗又为远矣”[70]。具体的区别是这样表述的：“凡蒙古部落之率先归服者，悉隶版图，犹视一体；及后至者弥众，皆倾国举部乐输厥诚，既地广人繁矣，乃令各守其地，朝岁时奉职贡焉”[71]。康熙《会典》记载止于康熙二十五年，其时喀尔喀尚未“内属”，如此记载，无疑忠实于当时清朝与喀尔喀蒙古关系的事实。雍正《会典·理藩院》列有多处喀尔喀“内属”“编旗分佐领”并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的记载，但缺少对其地位变化的总的概括。原因似乎是，喀尔喀各部落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之战及翌年多伦会盟开始，编旗设佐、封爵给俸、会盟朝集、贡献赏赉、年班围班、刑罚边务等一应制度性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经历一段随时随事立法和事例积累梳理的摸索过程，喀尔喀新的定位才会逐渐明晰起来。喀尔喀的“内属”地位，犹如漠南蒙古从关外时代到康熙中才固定下来视同“内八旗”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乾隆年间续修《会典》时，历史尘埃落定，才自然得出“与漠南诸部落等”的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咸入版图”[72]的结论。其疆理“东至黑龙江界，西至阿尔泰山与准噶尔接界，南至内扎萨克界，北至俄罗斯界”[73]。其后嘉庆、光绪《会典》，喀尔喀或称“外蒙古喀尔喀”，或称“外扎萨克”，均列于“理藩院”条目之下，以示其统属关系；而在乾隆、嘉庆《一统志》中则与漠南蒙古同列于内地各省统部之次的《新旧蒙古统部》[70]或《蒙古统部》[71]，以示与内地各行省无异。

准噶尔（厄鲁特）与清朝时战时和的对峙状态在喀尔喀内属后又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康雍乾这三位清代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的持续奋斗，终于在乾隆二十年代最终实现了太祖、太宗的政治理想。

从《会典》和《一统志》的记载看，在喀尔喀之后厄鲁特蒙古（及其所属的回部）所在的整个西域新疆地区纳入国家版图、视同内地郡县的过程，似乎要曲折得多。据康熙《会典》记载，厄鲁特“以时朝贡，奉职惟谨”，地位“视四十九旗又为远矣”[72]，至雍正《会典》，厄鲁特仍“视四十九旗为外”[73]。对与清朝长期处于时战时和对峙状态的准噶尔即厄鲁特蒙古来说，上述定位符合历史事实。乾隆十二年（1747）开始纂修、二十九年（1764）成书的《会典》和《会典则例》，记事止于二十三年（1758），其时平定准噶尔战争刚刚结束，《会典》等没有也不可能立刻反映准噶尔地位的变化。成书于乾隆八年（1743）的《大清一统志》缺载还可以理解，但“天威震叠，开拓西域地二万余里”的空前伟业竟在号称一代巨典的《会典》付诸阙如，这不能不使乾隆和他的大臣们深感遗憾。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一月御史曹学闵以“近年来，平定准噶尔及回部，拓地二万余里，实为振古未有之丰功”，奏请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军机大臣奉旨议覆，该御史所奏自属可行。乾隆谕示：“西域新疆，拓地二万余里。除新设安西一府及哈密、巴里坤、乌噜木齐，设有道、府、州、县、提督、总兵等官，应即附入甘肃省内。其伊犁、叶尔羌、和阗等处，现有总管将军及办事大臣驻扎者，亦与内地无殊。应将西域新疆另纂在甘肃之后。”[74]于是有《一统志》续修之举，与《一统志》同时重修的《会典》等也恪遵上述“与内地无殊”旨谕，对西域新疆部分（包括准噶尔和原准噶尔所属的回部）重新定位。重修的乾隆《会典》，实际上只重修了《理藩院》，其内容亦止于二十七年（1762）。该书《理藩院·典属清吏司》、《理藩院·柔远清吏司》条下记“准噶尔之地咸入版图，其封爵、会盟、屯防、游牧诸政，事厥有专司”，“画疆置吏，有如郡县”，昔日强盛一时的厄鲁特各部落已风流云散，《会典》及《则例》只记录了新疆与新疆以外地区的厄鲁特余部的名称——贺兰山厄鲁特、乌兰乌苏厄鲁特、推河厄

鲁特、额济内土尔古特、都尔伯特[75]——及其牧地四至[76]。而作为平准战争的延续，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的胜利，使天山南麓维吾尔族人民聚居的南疆各城，也相继纳入大清版图。乾隆《会典》记载“天戈所指，臣服迩遐，拓西域版图数万里之遥。今自嘉峪关以外，旧部若哈密、辟展、吐鲁番，新疆若哈拉沙拉、若库车、若沙雅尔、若赛里木、若拜、若阿克苏、若乌什、若喀什噶尔、若叶尔羌、若和田，棋布星罗，同属内地。[77]昔日准噶尔所踞西域新疆地区，遵照乾隆皇帝谕示，新设的安西州、镇西府、迪化州，皆归陕甘总督管辖，故《大清一统志》列在“甘肃统部”之后；至伊犁东西路库尔卡乌素、塔尔巴哈台，回部自哈密、辟展至哈喇沙尔、库车、塞喇木、拜、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则创建“西域新疆统部”，“次于直省之后”[78]。嘉庆《一统志》如之。通过及时续修的《大清一统志》，使大一统的中国西北疆域版图得到了权威的确认。

附带谈一点，厄鲁特等虽曾以“国”自称，甚至与承继中华正统的大清国分庭抗礼，以至兵戎相见，甚或有取代清朝为中华大皇帝之念，但他们与清开国时期欲取代明国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从来不自外于“中国”，原因何在？除了清朝士马强盛和怀柔政策的成功外，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藏传佛教这一独特的精神纽带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喀尔喀离散彷徨之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79]一言而决，遂全部归附清朝；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向康熙一再表白“中华与我一道同轨”[80]、“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81]；雍正时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向清朝使臣坦陈：“皇帝者，乃一统砸木布提布之大皇帝，经教划一，日后必令我得以安逸，而西梵汗、俄罗斯察罕汗虽为较大之员，但皆属于异教，无用之人”[82]，又称“无喇嘛佛法，何以为生？”[83]蒙古僧俗人士也相信“中华皇帝，乃活佛也”[84]。无视准噶尔与清朝治下中国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不可分割的事实，夸大其独立于中国倾向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中国大一统实现以后，土尔扈特以“大圣皇帝（指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决策回归祖国，进一步证实藏传佛教精神纽带的作用。[85]当然所有这一切，与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来，一贯有意识地坚持奉行尊崇黄教的政策关系极大，诚如康熙所言：“达赖喇嘛深知朕护持宗喀巴之法”。[86]

与喀尔喀归附清朝同时，环青海湖而居住的青海蒙古也大体循着“漠南蒙古模式”纳入大清版图。[87]。西藏则在康熙末趁大败准噶尔军威，进军安藏，废除和硕特蒙古藏王制。乾隆《会典》记曰：“（康熙）六十年，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鼐为公，总理其地”，乾隆十五年（1750）平定西藏郡王珠尔默特纳穆扎尔叛乱，随即设噶卜伦等官员“分辖藏务，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治藏体制初步确定下来。[88]西藏之地，分卫藏、喀木、阿里，辖六十余城，“东至四川边境，西至大沙海，南至云南边境，北至青海”[89]。在乾隆《一统志》中，西藏与内蒙古、察哈尔、喀尔喀、青海、西套厄鲁特等同列“新旧蒙古统部”[90]，在嘉庆《一统志》中，则与内蒙古、喀尔喀、阿拉善厄鲁特、青海厄鲁特、归化城土默特、牧场、察哈尔同列“蒙古统部”[91]。

上述中国版图逐步拓展的历史过程，乾隆《会典》作了如下概述：

> 国初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汗同时纳贡，厥后朔漠荡平，庇我宇下，与漠南诸部落等。承平以来，怀柔益远，北逾瀚海，西绝羌荒，青海厄鲁特、西藏、准噶尔之地咸入版图。其封爵、会盟、屯防、游牧诸政，事厥有专司。[92]

清代大一统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控驭版图之内边远地区能力切实得到加强，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意义巨大而深远。正如雍正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93]到这时可以说，传统“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拓展到了“天下”的第一重空间——古代“四夷”居住的地域，昔日边远蛮荒之地，一律“画疆置

吏，有如郡县[93]，用人行政，与内地行省无殊。清朝皇帝对中国的认识，从《会典》和《一统志》等最权威官书来看，乾隆中期以后的中国已不是古代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地区，也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在其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袤无垠的边远地区。狭义“中国”一词作为历史遗存虽然偶尔还挂在清朝皇帝的嘴边，但对外国人而言，中国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与大清国、天朝、朝廷等的含义完全叠合在一起，[95]只是用于不同场合，不复有任何区别。在大一统中国版图上生活繁衍的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数十个民族、部族，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凝聚在一起，对大一统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样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蕴蓄着，强化着。

下面需要进一步探讨清朝皇帝“天下”一词含义的第二重空间，这关系到国家统一大业完成之后，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疆界的最终界限，或者说，清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的外延所在。

清朝皇帝对中国疆界的认识和自我约束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

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96]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

> 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97]

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98]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99]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100]。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101]，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102]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

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30]，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30]。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

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31]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30]“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30]。“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30]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赍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30]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赍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31]。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31]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

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41]，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41]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

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

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41]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41]，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41]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41]，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41]，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41]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42]。“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42]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

“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42]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

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

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

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9]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9]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9]，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

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12]

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浹洽。我国家承天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12]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9]。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

序列中的合法地位。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92]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

“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93]。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13]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

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23]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93]。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93]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

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93]。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93]，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93]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93]，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与统而以“夷”称之的西方列强的冲突史不绝书，兹不一一赘述。咸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朱笔密谕惠亲王绵愉说：“中国以天下之势，而受累于蠢兹逆夷，甘载于兹！[93]可以看作清朝皇帝对鸦片战争至19世纪50年代末对“华夷”冲突中中国不可逆转的颓势的总括。此时距康熙“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的“逆料之言”不过150年，这令咸丰无限感慨和颓丧。

“中国”与“蠢夷”的对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建以后，至少在正式场合下，很快被“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或“与国”之类的对称取代了。[94]正当此时，开始“脱亚入欧”的东方日本也加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阵营，并表现出对外侵略的更大的疯狂性和掠夺性。这很快就引起了清朝皇帝的警觉。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间，日本借口“琉球飘民”为台湾土著所杀，派兵船驶往台湾，并由琅嶠、柴城一带登陆，“查看牡丹社等处形势绘图，并声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妄图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治特谕军机大臣：“生番地方，久隶中国版图，与台湾唇齿相依，各国觊觎已久，日本相距尤近，难保不意图侵占[94]。接着清廷又获悉“日本师船已与生番接仗”，遂谕军机大臣等：“日本并不遵约回兵，已与生番接仗，并拟即日移营进剿，其蓄谋寻隙，意图占踞，已可概见。”该谕旨特别强调：“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事关海疆安危大计，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后患！[94]在同治君臣们看来，台外“生番”虽未向化，但其生息繁衍之地台湾久隶中国版图，不得谓为化外游民。外敌当前，凡生活在中国版图下的一切民族一切部族都是国家必须保护的中国人。

迨至清末，中国统一又面临新的考验。

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偕光绪仓皇出逃西安，立足未稳，即下诏自责，指示与各国谈判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94]，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尔后，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于日本东京，宗旨首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94]。“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明太祖朱元璋号召汉族民众推翻元朝统治提出的口号，[94]而革命党人旧事重提，清朝统治者自然会感到前景堪忧。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统治岌岌可危，隆裕太后连续召集满蒙王公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清帝是否自动退位及相应的优待条件。当年十二月隆裕太后懿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方面谈判条件，该懿旨称：“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礼，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画[94]。必须指出，与满蒙上层统治者自身利益密切联系的还有，蕴蓄数千年、得来不易的中国统一大局

会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当年十月十一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上层王公贵族在沙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随即宣布建立“大蒙古国”，[14]提供了国家面临瓦解的现实例证。清廷在谕旨中也明确表示了对国家分裂的忧虑：“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廓，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94]当时内外矛盾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没有任何一件事体可以超越反映中国各族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国家统一问题。所幸这一重大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懿旨宣布清帝退位：

>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94]

清朝皇帝自动退位换来的民国方面的优待条件除皇室外，涉及满蒙回藏各民族的有：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15]

至此，隆裕太后的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而元明之际“驱逐胡虏”的故事没有重演，“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并延续至今，这对已经步入近代世界的中国无疑是一大幸事。抚今追昔，在肯定当年参与决策的各方面的政治领袖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和妥协精神的同时，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历史上合乎天理、顺乎民心的多民族国家统一趋势的巨大力量，而顺应并强化这一历史大势的清朝皇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盛清时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中国观及其作用亦应给予高度评价。

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①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源流”载，清皇室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国定号满洲”，“南朝误名建州”。这是清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撰稿者的杜撰。清开国时期从未使用“满洲国”一称。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8页。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

②《建州纪程图记》第22页。辽宁大学《清初史料丛刊》1979年版。

③④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

⑤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闰四月，奴儿哈赤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0页。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

⑥⑰据《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后，朝鲜“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4页。

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癸巳年九月。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5页。

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辛卯年，癸巳年。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1、313、315页。

⑨《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卯，谕西北蒙古喀尔喀部落查萨克图汗下使臣达尔汉囊苏喇

嘛曰：“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将蒙古诸国悉以与朕，今蒙古国主察哈尔汗之子见在朕皆抚养。”中华书局 1985年版。

⑩《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04页。

⑪北京图书馆藏：《后金檄万历皇帝文》：“朕虽屡获天佑，志气未骄，在人上不敢分毫生事。公正之人，尔南朝偏护边外他国，要杀之，方昭告皇天而起兵，不想天怪南朝而佑我。”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295页。

⑫⑮⑳《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295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同书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

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注：《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金致书明军守将：“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独据之地，乃诸申、汉人轮换居住之地也。”该书 378页。中华书局 1990年版。

⑭《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卯。

⑯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第1530页。中华书局 1980年版。

⑱《明神宗实录》卷三十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

⑲《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壬寅。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39页。

㉑参见《后金檄万历皇帝文》，《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289—296页；《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该书 377—378页。

㉒参见《辞源》(修订本）上册，第 87页，“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第443页，“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年版。

㉓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华书局影印本。

㉔《二十四史·后汉书》卷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 1997年版。

㉕㉞《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㉖《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乙卯。

㉗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㉘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中华书局 1980年版。

㉙江日瓘：《台湾外纪》第 20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㉚《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 272页，“敕谕明珠等比例朝鲜不便允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2年。

㉛《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

㉜《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九，顺治五年七月辛卯。

㉝《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六月丁丑，谕琉球国贡使：“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

㉞《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

㉟㊶㉒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㊱嘉庆《大清会典》卷四十九，《理藩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㊲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七，《理藩院·朝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㊳㊵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四。《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

㊴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二，《理藩院一》。

㊵㊷据乾隆《大清会典》卷七十九《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㊸《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

㊹《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乙巳。

㊺《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

㊻《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七，天聪十年二月丁丑条：“以阿禄喀尔喀部落初遣使来朝，赐硕雷”。

㊼《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顺治六年十月壬辰。

㊽《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九月戊戌。

㊾《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顺治十二年五月壬寅。

㊿《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庚子。

(51)《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戊子。

(52)《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

(53)顺治十二年初定例：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八札萨克，每年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八，谓之九白年贡。清朝赏每札萨克银茶筒各一重三十两，银盆各一，缎各三十，青布各七十。以答之。据《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五，顺治十二年十一月辛丑。

㊹《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条”：“谕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伊思丹津喇嘛等曰：朕曾遣使至尔处，迟至两月余，乃先令拜塔而后见尔等。”

㊺《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㊻《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顺治四年四月丙子。

㊼《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五月乙巳。

㊽《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子。

㊾㊿《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

㊿《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

(61)《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壬申；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辛巳。

(62)《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辛未。

(63)《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丁亥。

(64)《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五，康熙三十一年五月癸酉。

(65)《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66)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

(67)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二，《理藩院一》。

(68)(75)(89)(92)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

(69)(76)(88)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

(71)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三四。《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

(73)雍正《大清会典》卷二二二，《理藩院·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七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74)《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中华书局 1986年版。

(77)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徕远清吏司》。

(78)乾隆《大清一统志》凡例；卷四百十四至四百十九“西域新疆统部”。

(79)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载《清代蒙古史料合辑》(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80)《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甲申。

(81)《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

(82)《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 1010页。黄山书社 1998年版。

(83)《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 6页。

(84)《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庚辰。康熙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觐见康熙时说：“蒙圣主大沛洪恩，特加拯救，是即臣等得遇活佛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丁亥）

(85)据《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土尔扈特渥巴锡汗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密议，以“大国（中国）富强”，“大圣皇帝（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决策脱出俄罗斯回归祖国。见该书第 111页。民族出版社 1988年版。

(87)参见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至四百十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三十四至卷五百四十九。

(90)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至四百十三。

(91)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三十四至卷五百四十九。

(93)《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94)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柔远清吏司》。

(95)《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四，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谕旨称“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

(96)(97)(9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98)《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99)《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100)《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101)《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

(102)《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103)《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104)《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105)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106)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107)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

(108)《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111)《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

(112)《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

巳。

㉑㉒《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㉛《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㊶㊶㊷《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㊶㊶㊷《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㊸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

㊹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㊷《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㊷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㊷《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

㊷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

㊷《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㊷《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㊷《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 1989年版。

㊸《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㊸《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㊸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 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 250页)。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㊸《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

㊸《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㊸《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㊸《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

㊸《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㊸《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

㊸《清文宗实录》卷三二六，咸丰十年七月乙卯。中华书局 1987年版。

㊹转折契机是同治十二年关于是否允许各国公使觐见的廷议，李鸿章提出："泰西各国，见君向无跪拜之仪。本朝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各使不从中国礼节，良由习俗素殊。傥宽其小节，示以大度，似尚无捐朝廷体制。"他的意见，包括对西方国家的称呼为朝廷所接受。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清穆宗实录》卷三百五十，同治十二年三月丙午。

㊹《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五，同治十三年四月丙戌。

㊹《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五，同治十三年四月丁酉。

㊹《清德宗实录》卷四七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

㊹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革命文献》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4年影印再版。

㊹《宣统政纪》卷七十，宣统三年十二月己酉。中华书局 1987年版。

㊹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 215—218页。科学出版社 1958年版。

㊹《宣统政纪》卷六十五，宣统三年十月丁酉。

㊹《宣统政纪》卷七十，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

㊺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 1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